



文章列表

[媒介研究2007.1]《阿信》与《渴望》的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文章来源：本站 | 作者：李婉 | 发布日期：2007-11-01

《阿信》与《渴望》的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李婉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摘要：电视剧《阿信》和《渴望》都是以女性为中心，颂扬了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方女性的真善美。女主角阿信和刘慧芳的命运都曾记载着时代的变迁。她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女性判断的价值取向，激起了整个社会心理和观众审美心理的共鸣。在此作者以格雷马斯的叙事动素理论为依托，尝试分析阿信和刘慧芳这两位女性人格建构的区别。

关键词：格雷马斯；阿信；刘慧芳；人格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

1980年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中国播出，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期，一切都百废待兴，电视连续剧《阿信》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要，女主角阿信奋发图强的精神成了那个时代的强劲之音。十年之后的1990年，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渴望》播出，这是继《阿信》之后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刻画女性为主体的长篇室内连续剧。《阿信》和《渴望》的播出都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激起了当代观众审美心理的强烈共鸣。它们不仅是一次大众娱乐的大餐，更是那个转型时期国人心灵变迁的一种记载。它们都是以女性为中心，深切地讴歌了儒家文化视野中的东方女性的真善美。

《阿信》讲述的是女主角阿信由一个地位低下的贫穷佃户奋进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过程。电视剧通过阿信这样一个女性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命运的把握，向我们间接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发展史，并生动地展示了日本国民在战争的创伤恢复中生活的转化。相比之下，《渴望》中女主角刘慧芳是一个处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女性，电视剧跨越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在这段骤变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着产生了巨变，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寻找找到精神的家园。

作为那个特定年代的主体人物，阿信和刘慧芳都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如果说无私奉献、隐忍牺牲的刘慧芳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女性判断的主流价值尺度，阿信则以自己的奋斗成功史成为二战前后日本动荡社会的一个民族缩影。她们都是自身所属的那个大动荡大转折的社会中的理想型女性，为那信仰摇曳的一代人们找寻了社会角色的归属感。人们从刘慧芳和阿信身上找到了自己对认同感、归属感的本能需要，满足了一种自我意识的强烈渴求。为此，我选择《渴望》和《阿信》这两部具有可比意味的电视剧，通过中日两国女性人格形象塑造的不同，揭示阿信和刘慧芳这两位女性人格建构的区别和女性意识的变化。

一、《阿信》与《渴望》的角色模式

本文尝试借用格雷马斯的叙事动素模型这一范式来解析日本长篇电视剧《阿信》和中国的《渴望》中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进而通过对模型叙事的结构分析来剖析主体人物阿信和刘慧芳的行为动因，并通过女性角色在剧中的位置对比来分析作品中的实际位置由被动的客体向行为主体的转移关系，进而对比分析人物主角阿信和刘慧芳的人物类型及人格建构。

首先把《渴望》里的女主人公刘慧芳放置于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中加以分析，其人物类型可归纳如下（详见图1）：

重点专题 Highlights

- [媒介研究2007.1]中韩电视剧比较
- [媒介研究2007.1]中美情境喜剧典
- [媒介研究2007.1]中美电视剧比较
- [媒介研究2007.1]中国引进的海外
- [媒介研究2007.1]外国人眼中的中
- [媒介研究2007.1]中国国际电视总

NCRTSBBS//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论坛



相关链接 Links

- 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信息网
- 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
-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
- 亚洲传媒研究中心
- 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
- 媒体和法律资源中心
- 中央电视台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 奥运与媒介
- 国际传播学会

NCRTSBLOG//
学者观察 学者博客



发送者：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

↓

助手：刘大妈→主体：刘慧芳→客体：小芳的身世秘密←敌手：王亚茹、王沪生等

↑

受益者：小芳及其他人

图1

我们可以看出剧中的发送者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温柔、善良、忍耐、负重、顺从、忘我、默默奉献、自我牺牲等品质。正是发送者从内部推动核心刘慧芳毫无顾虑地默默接受着周边人及社会带给她的不公正待遇：在文革的年代，是慧芳用真诚的心帮助了处于生活最艰苦时期的王沪生姐弟；为了抚慰沪生、王母、亚茹这三颗受伤的心，她毅然冲破家庭、社会的种种阻力答应与“狗崽子”沪生结婚并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捡来的孩子小芳；可是丈夫极不情愿接受这个捡来的孩子，冷漠、自私的小姑子王亚茹也因此对刘慧芳百般刁难；只有生活并不富裕的刘大妈接受了刘慧芳对小芳做的一切安排，她始终支持爱护着慧芳；随着儿子王东东的出世，本应变得融合的家庭却随着小芳的真实身世渐渐变得脆弱不堪一击。善良的刘慧芳为抚养弃婴而放弃工作，拖垮了身体，失去了含辛茹苦营造起来的家……种种不幸接连不断地朝她袭来，剩下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小芳也将失去，谁又能够不为这位“好到家，又倒霉到家”的女性的悲剧命运震颤呢？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慧芳做出痛苦的选择……

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刘慧芳在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中可以被指认为英雄：她既要对付来自王亚茹的压力，还要抑制自己的苦闷情感；既要面对王沪生的不满，又要面对抚养孤儿的艰辛、两难的处境做出选择；而最终受益者不仅是孤儿小芳，还有刘慧芳身边的一群人（包括她的敌手王亚茹）。广大观众很容易被她这种真诚待人、舍己为人的大善之美所深深打动，但是，认真反思的话，刘慧芳的这种抉择是否正确？在刘慧芳心中究竟什么才是同情与爱情的界限？

阿信的一生谱写了一幅恢宏的人生奋斗画卷。出生在佃户家庭的阿信7岁就被父亲卖到镇上一家木材商家当佣人，童年的她担当起看孩子、持家的工作；长大后，为了生计她到一家理发店做工，在这里她结识了龙三并嫁给一个封建意识很浓的家庭，在家中阿信毅然承担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却饱受婆婆的虐待和刁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情地夺走了儿子和丈夫……面对这些接踵而至、无可躲避的人生坎坷，坚韧执著的阿信凭着对生活的信念一一挺过来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阿信》中的人物群像一一嵌入格雷马斯所创立的动素模型中。如图2所示：

发送者：生活希望、生存意念和女性传统美德

↓

助手：阿健→主体：阿信→客体：阿信←敌手：贫苦、战争、社会等

浩太等

↑

受益者：阿信

图2

面对生活阿信是别无选择的，永不磨灭的对生活的希望是阿信所有不屈不挠斗志行为的发送者。叙事动素模式中的敌手在阿信幼年时期表现为佃户阶级这一社会地位所带来的贫苦生活，随着阿信的成长，她所面临的敌手不再单单是深重的生活苦难，而更多是自身命运。相比《渴望》中刘慧芳的敌手而言，《阿信》中没有一个特定的贯穿始终的敌手人物设置。相反，在某一生活阶段曾经给阿信带来阻挠和烦扰的人都没有消减阿信的坚定的生活信仰，而是转化为对手的反方向——助手，推动激励着阿信奋勇直前的奋斗。出生于大商户的加代为了爱情，夺走了阿信的初恋情人浩太，可是伤心的阿信并没有因为朋友和情人的抛弃而绝望，她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从中却找寻到了自己的另一份爱情；出生于地主家庭，成长环境顺利的龙三是一个极具传统日本男人武士道式自大以及樱花一现般的脆弱心理特点于一身的男人。他懦弱、好大喜功，面对毁于关东地震的田仓商会他变得一蹶不振。客观的现实却不会左右阿信对生活的希望，命运又给了阿信、这个家庭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生活仿佛又在阿信预料之中向着幸福轨迹进发；军国主义扩张所带来的战争威胁，又给阿信带来了丧子的悲剧，随即被自己的信仰所欺骗的龙三，在绝望的武士精神中选择了自杀之路。无力阻止战争的阿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挚爱的亲人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战场这条不归路。可以说阿信的真正敌手不是人，而是阿信所生活的那个月的社会、战争、政治和自然。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从格雷马斯叙事动素理论中对比发现阿信和刘慧芳不同的人格建构。

（一）发送者、主体和受益者三元素的统一与分离——被动与主动的命运选择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分类，我们不难发现，在叙事动素模式中，阿信真正地充当了发送者、主体、受益者三位一体的功能。在以往大多数的叙事文本中，像《渴望》，客体往往是主体之外的其他利益者。然而在《阿信》中主体和客体统一了起来。阿信的行为指向，不简单地指向某一人或物，而指向为履行一个成熟人格的社会责任：为了帮父母减轻经济负担维持家中生计，也为了自身的救亡图强，阿信跻身进学堂、向东京美发师学手艺、开创天仓商会、开办连锁超市，这就有别于刘慧芳受难一生却单为了别人。也就是说，阿信的行为对象既是自己，也是他人。促使阿信行为的发送者不是像《渴望》中的某权威人物或男权文化，是兼具东方传统美德基础上的一种现代女性自尊自强的生存意识（这样的传统美德指不仅女性应该肩负，而且男性也可以兼呈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刘慧芳身上却只体现了阿信传统女性美德的这部分。作为帮手的浩太、阿健和龙三，支持阿信的仍然是她的个体事业和舒展仁爱的精神。而最终的受益者，也不仅是阿信奋斗终生应换得的一份安身立命之业，同时阿信的家人、朋友和周围更多人，让他们也随着阿信一同找寻着幸福。

相反，《渴望》中主体、客体与受益者三元素却呈完全的分离状态。核心人物刘慧芳的行动本身就是围绕着一个特定的环境格局——“家”，“家”在这里有了象征性的意味，家似乎就是刘慧芳的行动枷锁和精神牢笼，在这样的环境中刘慧芳处于一种被动的既定格局中。一方面表现在：面对王沪生、宋大成和罗冈三个男人的爱，刘慧芳自己都没有好好问问自己的爱究竟归属于谁，一个是刘大妈认可的可以托付终生的，同一个环境下共同患难的宋大成，一个是王伯母要她照顾的王沪生，另一个是爱她善良热于助人品格的罗冈，可是刘慧芳没有一个自主的选择。作为一名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她不具有作为女性主动的独立思维，是一个在场的情感缺席者。同时另一方面：面对自己的一味牺牲，刘慧芳没有冷静地关心过自己作为生命的个体在未来人生路上自我发展、自我选择、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她压抑住自身的软弱与悲伤，无私奉献、忍辱负重地包容着并帮助着爱她的或是伤害她的所有人，正是这样一种极致的道德殉难和人格魅力使她走向了自我背叛——在自己人生路上碌碌无为，在事业之路上她完全是一个局外的平凡人。刘慧芳的人格使她选择一种被动的人生。而这一形象的建构正是通过男性头脑中对女性的无意识心理积淀而预设筑成的理想范型。与其说倾诉的是剧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莫如说刘慧芳的形象只是表露着男性叙事者预构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价值观；承担着男人们需要的一个女性道德符号；抚慰着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末的文化阵痛。

（二）从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看剧中自觉的新女性形象

为家庭为丈夫而牺牲全部的刘慧芳被人们歌颂为完美女性的标本。与“完美”化的刘慧芳相比，《渴望》中的另一个知识女性王亚茹则被塑造成自私、冷漠、傲慢、多疑的对立女性，与刘慧芳正处于人格对立的两极，形成二元对立的模式。实际上，刘慧芳这个形象之所以能被推向极致“善”的审美思维，是以她放弃自我价值、自我意识空间和个人前途发展为代价的，她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的内涵并不完善和丰满。而与刘慧芳呈两极对应的王亚茹，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勇于开发自我价值，有事业追求和为理想奋斗抱负的新女性。

同样，在《阿信》中也有这样一个和阿信的自觉性相对应的女性，这就是阿信的母亲阿藤。母亲虽然是个典型的儒家文化传统和“仁义礼智信”等人文精神的传承者，但是她生活在一个典型的男尊女卑的家庭中，她对自己的丈夫只能言听计从地顺服，在家庭中演绎着“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纲常。她面对坚持要将年幼的小女儿阿信送往远方做工的刻薄与冷漠的丈夫，她显出一种弱势的无奈；得知阿信在木材厂商家失踪的消息，她每日倍加惦念，但痛苦与生活的重负却只能深埋在内心，却无法在丈夫的面前表露；面对自己的年迈的婆婆，她丝毫没有嫌弃。阿藤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太多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女人，只能充当家庭和生活献祭者。在“家”这个具有符号意味的牢笼中，她无法逃离，只能无谓地挣扎。这个形象和自己的女儿阿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再如，加代这个继承家族产业重任的富家小姐，有着和阿信截然对立的生活态度。这个承载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女性冲破传统束缚，为了爱情和浩太私奔，一厢情愿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幸福生活，最终还是以回归传统而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命运。

无论是王亚茹，母亲阿藤，还是阿信的朋友加代，都在电视剧中默默承担着一个辅托主角人格建构的符号。她们的设置和主角形成尖锐的对比，像是主角人物生命的反面镜像，暗示着另一种极端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缈译，三联出版社，1999年。

[2] 张育华：《电视剧叙事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

[3] 曾庆瑞：《电视剧原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

[4] 周靖波：《电视剧作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

[5]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6年。

[7] 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及应用》，载《法国研究》，2003年01期。

[8] 姚海燕：《认同与抗拒：影视艺术接受心理探析》，载《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

[9] 胡连利、刘伟娜：《媒介对女性的误读与重建》，载《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卷）。

A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of Leading Figures between the television drama *Desire* and *Aosin*

Li Wan

(School of Cinema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television drama *Desire* and *Oshin* both take female as its leading figure, which are starred by the female as a symbolic union of truth, kindness, beauty and the essential quality in Confucian culture. The fate of leading figures Oshin and Liu Huifang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and represents the female value system of the whole society, arousing the sympathetic response in the whole socie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Greimas narrative theory to analyze the distinctions of th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between Oshin and Liu Huifang.

Keywords: Greimas narrative theory, Oshin, Liu Huifang, Character construction, the principle status of female judgment

收稿日期：2007-04-01